

中国文化解读

内容提要：

本书分为五章，分别为：第一章 学者"包装"——一个不得不说的话题、第二章 婚姻、爱情"多面玲珑"、第三章 走出"崇拜"的沼泽地、第四章 娱乐"名"星扫描批判、第五章 女人审美心理"大革命"。

第一章 学者"包装"

——一个不得不说的话题

关于文人"包装"的文化时尚暂时不敢扯到人文土壤、良知和教养这些对于我国文化工作者还太高深、隔膜的问题上去，从某种意义上说，反而会削弱了文章的现实批判意义，显得有些酸腐。貌似忧国忧民忧文化，实际上什么都没说明白。这种虚的、矫情的、酸的特点，在他们的许多文章里都存在，而且大有在未来时日里发生重大病变的征兆。

"学者包装"的出现是经济市场化的产物，也是社会文化趣味时尚化、庸俗化、休闲化的一种需求。学者需要名气和稍宽裕些的收入，出版社需要响亮的品牌和高额的利润回报，媒体需要愈演愈烈的争执与诉讼、层出不穷的饭后谈资，公众则需要个人兴趣以及失衡心灵的抚摸，四方当事人士可谓各取所需。这种情形是商业社会文化领域所出现的几个必然趋势中的一个，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原属无可厚非的。但是，由于"学者包装"涉足的是文化领域，其实质是行商业乃至其他物欲之实而借文化之名，两者不仅风马牛不相及，而且目的性还时有针锋相对的意味，这便不由不令身为芸芸读者中的我们小心：那些媒体与街市上层出不穷的名人名著，其光彩夺目的热闹背面，是否藏有某些异样的东西？

这并非危言耸听。事实上，近年在文化市场上热销的诸多作者以学者、文化人面目出现的文化著述，已经或多或少地让人感觉到其中所蕴藏的一些病毒成分了，它们正对我们的精神生活，构成不小的危害和污染。

1. 余秋雨的以"雅"包装

大家知道,"文化散文"这个提法是在余秋雨的《文化苦旅》、《文明的碎片》热销后,被媒体和读书界大张旗鼓和一本正经地推广起来的。一时间,书店书摊一度迭遭冷遇的谈古论今、谈禅论道、学界掌故类书籍开始成为读者的宠儿。前几年出版界所谓的"散文热"指的其实就是这类东西,外加一部分名人名家的人生感悟。这种"学者散文"、"文化散文"之所以会热销,无外乎两个原因(本身上的):第一,写得很蒙人——文章里经常会出现当代人颇为陌生的古诗词歌赋、古代历史朝代的变迁掌故、文人行迹乃至名胜古迹背后的故事……凡此种种,多少年来均被人们视为一种高雅的品位。而我国的事就是这样,一帮人越缺什么有人就越会高唱什么,所谓"文化散文"、"学者散文"之所以大行其世,倒也证明了捧场者的没文化和写作者商业趋利意识的觉醒。而有意思的是,这类以历史和传统文化为佐料的著述,在商业时代新起的"白领"人士中最有市场。因为这部分人大多属于某一领域的专业人才,工作的紧张使他们无暇去读专业以外很多的书来充实自己,而他们的精英意识又颇强,对品位格调又极为看重,余秋雨这样的作品一不费解二又优雅,恰好满足了这些人进行文化自我粉饰标榜的一个需求。第二,余秋雨的文章不但不费解,而且写得还很煽情。上海学者朱大可可将余著称为"文化口红",也正是源于我们上面所分析的这些原因。我们不可否认这种抒情性写法赋予了余秋雨等人著作以很强的可读性,但可读性增强之余,作者的学者视点却显然被大大弱化了,学者摇身一变,成为流行作家。按说,这对作者本人或许没什么不好,至少版税高多了。可令人遗憾的是他这些产品在市场上却照例要打着"学者著述"这样的旗子去卖,购买者也愿意继续认为这是学术性读物,这样一来二去,许多严肃而严格的标准便被混淆了。与此同时,这种源于误会而导致的热销还会给写作者本人带来两种致命的危害:一是因过度膨胀而心理失衡;二是文章越来越空洞没有内容。

从《文化苦旅》、《文明的碎片》,到《山居笔记》、《霜冷长河》,再到《千禧之旅日记》,我们所目睹的余秋雨,正是经历了这样一个身份由"学者"而"流行作家"而"文化名流",作品由"兴趣性著述"而"历史言情散文"而"名家意识流"的完整的滑翔过程。在他的著述中,标志着这种滑翔及其对文化、文明的理解阐释存有明显欠缺的文字随处可见。

比如序和后记,余秋雨写此类文字的兴趣似乎远比其他作家为大,篇幅也要长得多。更有趣的是,如果你在读余教授的散文时想知道自己已进入到高雅的哪种程度,序和后记能告诉你。

首先,你能知道自己在看一本特别有品位的书。余先生在序文里讲一则令人气恼的事时没留神说了,台湾有本书叫《到绿光咖啡屋听巴赫读余秋雨》。巴赫是谁呀?古典音乐"3B"之首,比贝多芬资格还老。听巴赫读余秋雨既然被有人视作为一回事,想必余秋雨先生的文章不会比古典音乐作品次多少吧?高雅是一定的。

又比方说,余秋雨先生总是一提再提盗版者牟取暴利的可恶,解释自己推出某本

书纯系基于对非法谋利行为的反抗。这话从逻辑表面上看似乎可以说通；但细想一下，盗版者盗您的书，与您自己的正版书篇什么屡有重叠，这两件事实在构不成因果关系。执意牵强辩解，反倒让人觉得假。

凡此种种，堆积到一起，便给人以余秋雨的书或序或后记太长太唠叨的印象。而这么时不时在书前书后罗嗦一把自我表白，我以为实在是作家太笨的表现。其实一本书出来就出来了，随人家看便了，再多说什么均属徒然，搞不好还适得其反。真诚一旦过头，难免被人疑为有假。因此读完余秋雨先生的几本书后，序或后记便首先给我带来了抵触情绪，过后再稍微往细处想想，不对劲的地方便也一个接一个开始呈现了。

因为这类通俗、浅显还夹带一些基本常识的文章在任何时代都会享有广大读者的。余秋雨在今天的风行，正如秦牧散文在 50 年代、七八十年代之交的受欢迎。两者的基本读者都是中学生到大学生，以及他们这个年龄段的其他年轻人。再说明白一点，余秋雨就是 90 年代的秦牧。因为迄今为止，我们除了能从余秋雨随笔作品中体会思古之忧，沧桑之感，以及相应某个领域里的文史小常识之外，似乎再无什么额外的东西了。秦牧当年也是这样，只不过他文章里那个时代的烙印与局限更多些罢了。

我们读余秋雨的文章要注意一点，作者对文化、文明的理解与阐释有问题：要么白开水，要么把你笼罩在一派文化的肃穆之中，那肃穆会令人对一些常识性的谬论提出质疑和反驳。

白开水的例子眼前明摆着，“千禧之旅”的一系列日记，也就是一个普通人的观感吧。谁写都能行，一位名教授、名作家这么不疼不痒地码出字儿来，我想多少还是活儿糙了点，次了点。要是随便哪个记者都能写的文章，何必劳驾您余教授呀，我们又何必非看您写的呀？这个问题，余先生不知想过没有？

谬论的例子即以名篇《遥远的绝想》做示范：余先生作为一位资深学者，一位 90 年代的作家，非但没有给我们提供审视历史的崭新视角，反而对一些传统典籍与文人千百年来胡说的八道、矫饰夸张津津乐道。比方他写阮籍在广武山楚汉战争旧址感叹“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时，只轻描淡写以两句“茫茫九州天地，到处都是为争做英雄而留下的斑斑疮痍，但究竟有哪几个时代出现了真正的英雄呢？既然没有英雄，世间又为什么如此热闹？也许，正因为没有英雄，世间才如此热闹的吧”来告一段落，感叹了半天，跟什么也没说一样。其实阮籍的“英雄叹”里所存在的我国封建文化与文人的硬伤，他一点也没有指出来。英雄，什么是英雄？在阮籍这类人的头脑里，刘邦、项羽、曹操、司马昭是不是英雄，其实并不构成一个问题。他所慨叹的，是人间没有一个令他钟意的符合他理想的统治者来统治他和广大的百姓，一旦真有这样的“英雄”出现了，阮籍的痛苦与牢骚也就没有了。所以阮籍对“英雄”的呼唤，不具备任何文明与审视的高度，充其量也就是一个色艺双绝的弄臣，因为知道在他的时代找不到一个好的主公，而自怜自叹发出的哀鸣罢了。哪里有什么风度，简直令人笑掉大小牙！

再有阮籍去漂亮小媳妇的酒坊喝酒的事，这事放在今天，谁那么干一次，虽说没有谁说你丢人，可也不会鼓励你夸你说好宝贝真够爽再来一次。怎么一旦进了史书和文人的笔下，竟全成佳话了？对于这种事，我信它的真，却实在怀疑津津乐道它的人。

中国文化解读

余秋雨写嵇康的死，悲愤之情溢于笔端："这是我国文化史上最黑暗的日子之一，居然还有太阳。"看到此处，我们不难为之感动，但一经我们寻思考虑一下。不对呀，文化史上最黑暗的日子，跟出不出太阳没关系吧。出太阳是大自然的事，大自然又不是为我们人类专门创造的，人家犯不上跟咱瞎掺和。而且就嵇康被处死而言，也不一定就是"我国文化史上最黑暗的日子之一"，因为此前你只要关注一下史书的记载便会发现，他一直以一种文人的方式在跟社会与统治者叫板，封建时代，人家不拾掇他倒怪了。他那叫得其所哉。

回头来说余秋雨，无论他是作为学者，还是作为一位文化责任心很重的作家，他的学识和才华还都没有完全地用在应该用的地方，因为他只顾带着我们走向那一个又一个的传统与历史的驿站，行色匆忙，却忘了或根本没意识到我们今天做这些应该达到一个怎样的目的。在这一点上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一书所作的表率值得重视。其中真正点出了我们今天生活得如此糟糕的内在根源。这也应该是我们现今的文化人，今天做学术乃至从事文化题材随笔写作的一个重要方向。

余秋雨先生很有才华和聪明，可能也读了不少我们注定这一辈子都不会读到的书。但可惜，他的文章里没有我们要的东西。相反，随着他老先生的声誉日隆，我们日益在他的书里发现了太多的"大牌"作派，以及过分的自怜，在某种程度上讲，这已经宣告了学者包装中以"雅"包装一路的失败。

2. 王小波的"边缘"包装

如果讲,"到绿光咖啡屋听巴赫读余秋雨"是迄今为止余秋雨著作在内地的最为响亮的一句广告语的话,那么王小波最令人记忆犹新的一句宣传口号莫过于"文坛外高手"了。就王小波作品在当代的水准而言,"高手"确系定评。所谓"文坛外"则无从提及——因为理由不充分,无非是他先前在国内役发表过文学作品,而且未必是作协的人等等。但这后来都被王本人及与其有过交往的人一一打破了:于是我们纷纷在《花城》、《读书》等雅得不得了的杂志上也频繁见到王小波的名字;于是我们知道王是学管理的学者,先后在北大和人大教过书,与不少教授、作家是朋友;身边或远或近的人如夫人李银河、友人艾晓明、合作者张元、谋过面的刘心武……也都是北平的精英人士,所以看来这个"文坛外高手"的名头,也无非是出版商想出的一个聪明点子吧。

不过,王小波是个不幸的才子。"文坛外高手"亮相后,只是圈内热,真正在书店取得胜利时,他本人却已不在这个世界上了。《黄金时代》的作者死掉了,我们再也看不到他那些与《黄金时代》同样有趣的随笔文章了,这让人难过。而就在我们难过的同时,我们却看到了他生前写的莫名其妙的《青铜时代》、《白银时代》也一并狂卖,而且还被亲朋好友奉为"浪漫骑士",这让我们感到错愕,进而意识到,当代文学界文化界对于作品坏与好的标准仍然是暧昧不清,既受体制内既成传统观念的限制,也受到市场运作以及亲情友情的侵蚀。而经历了这一连串的限制、运作和侵蚀,王小波的著述开始脱离作者写作它们时圈定的轨道,沦为受制于几种合力包装下的时尚读物。更确切地说,王小波由于他写作初始的"边缘"状态所具有的可炒作性,由于他后来猝死所具有的新闻爆炸性,成为了出版界一个可以长销的品牌。王本人著述中哪一部分有价值哪一部分没有价值,甚而哪一部分有负面价值,倒都成为没人关注的事了。这结果想来九泉之下的王小波也会苦笑。他写了什么并不重要,这个世界看重的是他好卖,而且还同时顶了个"边缘"、"另类"的名头。

王小波的具体作品,质量、状态均是五花八门,参差不一的。虽然同属热卖,小说集《黄金时代》当属首位,属于当代经典;随笔杂文当推第二,属于学者兼作家中,作品水准颇高的一位,有智慧,部分地方还透着犀利,但要硬捧到"伟大"的地步,可就会吓着人了。

即便如此,在他颇具水准的随笔杂文著作中,有一些地方,也还隐藏着某种细看之下不太让人舒服的东西。例如王小波《我的精神家园》的"自序"中有这么一段文字,"……我很以作明辨是非的专家为耻——但这已经是二十年前的事了。当时我是年轻人,觉得能洁身自好,不去害别人就可以了。现在我是中年人——一个社会里中年人要负很重的责任:要对社会负责,要对年轻人负责,不能只顾自己,因为这个原故,我开始写杂文。"

说真格的,这段文字中那句"要对年轻人负责,不能只顾自己"真叫人令人深思。

在我们看来,在今天这个出不了鲁迅而暂时又容不下"李敖第二"的年代,文坛

里冒出了王小波这样一位文章家，确实也算是一件盛事了。毕竟不是谁都敢自称代表“沉默的大多数”，为人们留下这么多充满智慧的美文的。但这次终于不一样了：我们发现了王小波非凡之中一块平凡的阴影，原来他也像历朝历代有了点经历了点年纪而又不幸写了几篇好文章的雅士们一样，惦记着“要对年轻人负责”。这不禁使我们想起了鲁迅当年笔下的胡适、徐志摩那几位“青年导师”的典故。诚然，胡在今天我们这班后生小子的眼中是学问大家，徐则已成为现代文学史上为数不多的留下传世之作的艳诗名家，但两人当初却也确实像今天许多热心的长者们一样，写过不少为青年人指路的文章，作过许多咸吃萝卜淡操心的讲演。他们当时也是本着一腔“要对年轻人负责”的热情去做那些事的，生怕没有了他们的指点，后辈们会走错了路。可就我们所知道的，结果却不如他们各自在文学和本业上成就辉煌。甚至在今天的文学史教材中，还不巧留了那么一两处轶闻和笑话。

当然，我们也明晰：王小波所谓的“要对年轻人负责”无非是指他自己立意要写一些清白的文章，为这个思维与概念屡屡发生混乱的世间尽量还一些本色。立意是极好的。同时，他希望通过用自己亲身尝试过的一些悲剧性经历来规劝后人，使他们将来不致再犯那些要命的颠倒黑白的错误。动机也是极善良的。但我们还是觉得他以及那些至今仍健在的、有着和他同样美好动机的长者与文人们犯了一个错误——过高估计了自己个人的能力，过高估计了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价值。

首先，我们来看“要对年轻人负责”这一良好愿望的可实践性。

先说范围。“年轻人”究竟包括哪些人？是一部分人的指称，还是所有年轻人的总体？如果是一部分年轻人，究竟是指高中文化水平以下的还是高中文化水平以上的？是当选过“杰出青年”的那部分还是被定为“失足青年”的那部分？种种区分，小波先生的文章没有明示过，许多发表过类似议论的饱受了人生之沧桑的健在的先生们亦没有明示过。如果“年轻人”是一总称，那我们想其人数之多。所处社会阶层之复杂、生存背景之广阔、思想落差之悬殊，当不是热心的导师们所能预料和应付得了的。所以说，“年轻人”之范围极难确定，是个很虚的概念。

再说目的。“负责”，负什么样的责？恐怕不会是指经济上面的责，诸如代办购房按揭、代为购买伤病保险、代还欠债之类。显然，前辈想负的是道义上的责。那么道义上的责有哪些呢？是劝失足者们向善还是保证一个目前纯洁的灵魂在茫茫人海中今后一世平安不被玷污？两者似乎都不是容易事，同样也好像很难检验其努力的奏效程度。那么思想深刻高尚之如王小波的长者们，究竟要为年轻人们的道义前景较哪些劲？又怎样较劲呢？这样再执意追问下去，前辈长者们的“负责”似乎看起来只好庸俗地去解释了一一乃“瞎较劲”。

所以说，“要对年轻人负责”看来目前只是一个愿望的表述，断没有谁真考虑过要将其实现。“可实践性”几乎为零。

其次，将“要对年轻人负责”这一句式逆向推之，问一问大家，谁可曾见到一个年轻人写的文章里有“我们要对年长者负责”的说法？

没有，确实没有人见到过。几千年来仿佛人们早已习惯了年长者们自上而下发出的忧虑和喝问。这也难怪。因为所有的年轻人都是生活在一种无畏的天真和乐观的奋

斗里的。他们还没有谁精明到要那么细致入微地总结和分析自己每一次的经验教训，然后再以一种煽情状态的悲愤控诉这个世界对自己的剥夺与欺骗！总结经验的工作总是由中老年来完成的。

而正因为总结出了“这世界终究对我不起”式的结论，接下来就产生了倾诉的欲望。倾诉毕竟是一件神圣能打动人的工作，可一旦长期倾诉，循环往复地倾诉，一唱三叹地倾诉，就难免有些让人发烦了。这时，便最好在倾诉时先对听众说上一句“唉，你知道吗，这些日子我真替你们担忧”作为悬念，以求抓住大伙儿了。就是这么回事。王小波的那篇《自序》中“我要对年轻人负责”的那番话，便是这样体会的。王小波作为一个创作多年的作家和学者，固然有着许多深刻而真实的忧虑要向读者表达，可也不会一点儿也参不透老辈人的“儿孙自有儿孙福”那句话中的哲理，硬努着要为那些虚幻的说不清的东西较劲，同时还对别人露出那么一股子岸然的说教师父嘴脸。小波先生没真想要为谁负责，只不过把自己那些杂文结集出版时有些底虚，怕被某些市侩文人视为“矫情”，故而仓促间才找了这么个虚假的道义上的口号来做幌子。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们倒认为那也是很悲哀的。因为虽然是幌子，他毕竟也露出了羡慕“青年导师”封号的嘴脸了。而他却又实实在在写过那么多好的文章。

当然，上面所说的这点并非是王小波随笔著述中的思想主流，仅属作家“一不留神”露出的东西。若单从近年接受包装而成为热卖作家的作品质量而言，王小波仍无疑是最具水准的一位，对读者而言，也是最具积极意义的一位。

3. 周国平的以“酸”包装

周国平的名字为人所知是在 20 世纪 80 年代。在西方现代思潮风起云涌般进入我国内地思想界、学术界乃至读书界的时候，周国平以一册三联版尼采选集《悲剧的诞生》的译者，以及稍后上海出版的《诗人哲学家》的主编者的身份在青年学子中颇具声誉。之后我们就开始见到了他陆续发表在报纸杂志上的那些谈哲学或以哲学名义谈论人生的文章。接下来我们发现这些文章越来越多，并结成各种集子出版，随笔作家周国平渐渐地把我们心目中的那个学者周国平的模样隐去了。1996 年，《妞妞，一个父亲的札记》出版，这部取材于作者生活的略带思辨性的作品使得作家周国平开始在媚雅一族读者中享有盛誉，也开始成为书籍市场上一个稳定而知名的品牌。值得注意的是，迄今为止，作家周国平总是在文章或对话里反复强调，自己是搞哲学的。

有鉴于周国平的这种自我职业错位感，我们可以将他定位于“以酸包装”这一档次。所以界定其“酸”，原因大致有两个：一是周在文章中屡屡引证的哲学原理和所列举的例证，一部分属于众所皆知的常识，一部分则属于名人轶闻，就学术程度而言，专业性不是太高，普及性倒有一些。与其说他是在研究哲学，不如说他是在用文章普及某些基本的哲学原理和常识。作为我国社科院的研究员、博士，学者是他的职业，但就文章而言，他的这些工作倒更贴近于“哲普作家”（借用“科普作家”的命名法），而且，有些地方，还存有把一些哲学理念庸俗化的迹象。既挨不上时代学术前沿的最新成果，一不留神还会背上“硬努着说事”的名头，颇让人觉得其酸腐。二是周的作品套话太多，空洞的说理太多，我们感觉其文字既无才气，又生活在真空之中，读着没什么劲。而周本人呢，自我感觉还特好，时不时还扯来托尔斯泰之类的巨腕来说说自己干的那些零活儿，以显自己工作的意义，读完让人觉得怪怪的。说这种文章有多大病倒也不至于，可看了总给人以拿着端着的感觉，因此只好说他酸。

举他的名作《妞妞，一个父亲的札记》为例。此书倒也算性情之作，用周国平自己的话说，是“在死亡阴影笼罩下抚育女儿的爱哀交加的心境，我在摇篮旁兼墓畔的思考……”许多地方也确实让人叹息、泪下。然而，偶然你跳出来再一想，会发现有两个不对劲的地方：一是人该不该对人生经历的剧痛采取这种自虐式的反诘，这样咀嚼痛苦玩弄悲剧是否也属于一种病态？二是写这样一本书的行为本身，对自己、对读者、对逝去的生命是否过于残忍了？换了别人，会这样做吗？还有就是真实性，家有亲人患病，谁还能有功夫想那么多玄玄乎乎的东西？怎么读怎么令人不信服。倘若这是事后追忆、补记，不是不可以，但牵强的成分未免便更重了。所以说此书倒也算是一本独特的书，可性情中不健康的東西还是挺多的。是不是哲学我不知道，总之矫情。本来挺感人的真东西，镶了个金边儿倒透出可疑来了。

周国平最近好像还喜欢和别人对话，比如年初时跟崔健对那一段《音乐批判文字》，真让我们这些外行拾乐了。

其中谈到了崔健的《一无所有》与周国平的《尼采：在世纪的转折点上》，似乎从中两者感觉到了一种沟通，并且从中发展开去，从音乐史、文化史、心灵史上的地位

问题去恭维崔健，从中并没啥心灵史，让人难解，两人谈话之中，周国平竟将“文字的东西”和“内心的感悟”作为两个对立项，让人笑话。因其不仅是作家，又是搞哲学的，另外两人还有对摇滚乐的交流，其中周国平有愤怒是音乐之外的东西，不是摇滚乐本身的特征的发问，实让我们怀疑他的逻辑思维能力，一个号称搞哲学的人，从中不能不让人深思。

曾经有一回听人说起周先生的那些散文随笔，对方用了一个很新鲜的讲法，喻之为“哲学界的汪国真”，听了既让人有些觉得过分，再细想又觉得有那么点道理。比如汪在外界一般给人营造的是“诗人”形象，周呢，喜欢以“哲学学者”的形象示人，两人的文字在他们声称的诗或思的范围之内，又实在仅具低幼普及水准，够不上业内的价值。两人之所以在读者中都受到一定青睐，一方面在于他们在标榜的行业标准上勇于降格（或是以“本格”）趋时，对许多东西诠释得夸张而通俗，同时又满足了许多青少年的懵懂求知外加一点媚雅的虚荣。于是买方卖方各取所需。所不同之处在于，汪国真的卖点显然更集中于低幼化调的卖点则较集中于青年人。周国平他兴趣异常单调和枯燥。与此同时，他的文章还有一种内在的牵强的说教，构成了他作品思想中很矫情的一面，如他写《医学的人文品格》一文，控诉当今医疗腐败，并举出当年怀孕的妻子高烧去看病竟遭漠视甚至刁难的事为例，事情到此已很说明问题了，可周不在接下来的部分里探讨敬业精神与医德教育对当今医疗行业的重要性，而是非要扯到人文土壤、良知和教养这些暂时对于我国医务工作者还太高深、隔膜的问题上去了，反而削弱了文章的现实批判意义，显得有些酸腐。貌似忧国忧民忧文化，实际上什么都没说明白。这种虚的、矫情的、酸的特点，在他的许多文章里都存在，而且大有在未来时日里发生重大病变的征兆。前面所点评的类似《音乐批判文字》中的问题，不过是先给我们大伙提了个醒。

4. 余杰、摩罗、孔庆东的以"怒"包装

作为读者的我们，将余杰、摩罗、孔庆东放到一起来的看待是因为两点：一是他们比前面几位都年轻，辈分上晚了一代；二是他们代表了目前我国出版业学者包装的较新成果和水准。从当年的几匹"肾马"倒今天的"新青年"，他们发狠撒野、扮哭扮笑，成功地把众多语言垃圾打造成文化快餐品牌，在进一步为这个堕落的、灵魂低迷的时代推波助澜，粉饰个性。

相信我们对作业杰的作品关注均是始于《火与冰》封面上"我国大陆的第一个李敖"、"北大的第二个王小波"、"抽屉文学"，封底的"本书出版前，曾以手抄本形式在首都九所名牌大学中悄悄流传"，诸多宣传语不能不让人注目。

当我们以为上面而产生好奇便去翻书。有一些地方还算合心意，比如对"钱学"的怀疑，比如对郑州大学将一个不向外资老板下跪的打工仔特召入学的思考，都表明作者确实是一个有一定想法和分辨力的大学生。但也仅限于此了，因为书中的众多感慨地方一旦去除了青春期的烦恼孤寂、去除了大学阶段人渴望发言证实自身存在的可爱动机，便只剩下一些人名、书名和引文了，没有特殊的地方。《火与冰》给我们的感觉就是：这是一个挺勤劳挺爱想事儿的大学生写的一本书。文字较流畅，比大学校刊或社团刊物上发表的文章稍具个性。作者有闯劲儿，不管是不是有价值，也不管是否存有学理或知识结构上的欠缺，他想到什么就敢写出来，套用现在王朔老师的书名，有股子无知者无畏的劲头。至于他的想法本身，倒未见得犀利，或有什么让人眼前一亮的东西。

再后来，一两年的功夫，我们又见到了《铁屋中的呐喊》、《文明中的创痛》、《说还是不说》、《想飞的翅膀》等书，留意翻看一下，发现余杰又多写了不少读后感，多练了两招摘抄外加批注的功夫，研究生的学历显了出来，思维方式却无大变，甚至有的书里，独自思考所有的内容要远少于《火与冰》中的含量。于是也就有些明白，像余杰这样的年轻作者，骨子里跟余秋雨是没有什么不同的。惟其少了些阅历与世故，便随手扯了身上的愤懑和图书馆里的人名书名来做幌子了。外界向来敬畏书名人名的媒体记者又多，终于又造出一个思想者的形象。其实想这样靠"文明"、"文化"成事的作者恐怕还有很多。他们只是想靠写稿赚些辛苦钱而已，真要苛求他们思想，还真难为他们啦。

但我们可读到余杰在思想的尺度上的把握欠佳，似乎在这方面硬伤太多。比如关于校园经商，余杰怎么看呢？他写了一个故事："室友Q君曾经也是文学爱好者。一进大学，才发现文学并不那么可爱……几经周折，他成了报社与企业的广告中间人，每月有数千元的收入，于是，他彻彻底底地从教室里消失，佩上BP机，拉着一帮哥们，奔走在城市充满欲望的大街上。来自贫困山区的他，第一次进高级酒店，第一次买狐皮大衣，第一次喝麦氏咖啡……钞票改变了他的生活，而理想什么也改变不了。于是，口袋里装满钞票的Q君，一脚将理想踢开。"（《给理想一把梯子》）在这段话里面，余杰至少有几个问题没搞清楚：一是什么是理想？可以构成理想的人的愿望有哪些？一

个人产生理想，他的起始出发点一般情况下在哪儿？二是“爱好文学”与“理想”是不是一回事？舍弃爱好文学而去挣钱，是不是就意味着一个人对理想的抛弃？三是改变自身的生存状态，这种举动本身，是不是在余杰的眼里就从来是堕落的与理想绝缘的？

又比如看待留学生的狂妄，余杰也有一段故事：“在北大的校园里，我最厌恶的便是日本留学生，他们那副飞扬跋扈的神情跟当年的侵略者没什么两样。有一次，两个日本留学生在教室里抢占座位，将我国学生放在桌上的笔记本扔到地上。我国学生彬彬有礼地解释说，用笔记本占座是北大的规矩，小日本却狂妄地回答道：‘这是你们的规矩！’于是，遭到了针锋相对的回答：‘在我们的土地上，就得守我们的规矩！’两个家伙在一致的谴责中灰溜溜地走了。他们实在顽劣得可笑：想在以反日为契机的五四运动的发源地——北京大学张扬他们的大和魂，实在是找错了地方。”（《丑陋的牡丹花，丑陋的日本人》）。然而我们读到这一段，仍然觉得余杰有一些东西没有搞清：一是在所谓“思考”性的文章中玩这种煽情写法，从某种角度上讲，是一种对读者的蛊惑和误导。思想要冷静，不是浪漫的激愤。写日本人的丑陋不要随时与你的民族义愤瞎挂钩。二是没教养和狂妄是小日本儿的几大基本丑陋之一。余杰要想“思考”，就必须改进他那种一根筋的思维方式。三是那种自负的“北大情结”的流露。不过是一场吵架的结果，关北大人和“五四”运动什么事？哪儿也不挨哪儿。虽然写的时候可能很过瘾，作为“思想”，就有弱智之实和盗名之嫌。再说，我们似乎有这样的感觉，北大除了蔡元培任校长的那一两年，剩余时间也就是青春荷尔蒙发作外加一通瞎折腾，没给社会带来什么实质性文化补益。尤其这些年，倒是文科类学者与弟子们的矫情和利欲熏心彰显了。

还有就是对所谓“承担”话题的涉及。一方面，余杰的文章里大肆赞叹与赞美一个前苏联作秀诗人叶甫图申科《提前撰写的自传》，抨击我国当代一些诗人“放弃做公民”，对历史和现实没有尽任何义务。并为诗人定义是“宁可被杀，也不杀人的那一类人”。还举顾城的结局为例，作为“近代以来，我国诗歌与暴力合谋，堕落为暴力的帮凶、帮忙和帮闲”的证明。《诗人在天堂和地狱之间》另外一方面，余杰又写道：“明代的方孝儒与50年代的胡风，我都有些不以为然：哀其不幸，怒其愚争，枉送卿卿性命。我的意见是：若知山有虎，莫向虎山行。”（《〈资治通鉴〉批判》）两套高见如此自相矛盾，也真不知道他是如何思考的？莫非余杰意在以前者要求他人，以后者要求自己？上世纪我国人最恐怖的事便是妄谈理想与承担，误国误己不说，还有以此作为打人的棍子皮带的。

我们仍可发现余杰还有一个发育上的新症候：越来越爱拿胡说当正经的思想贩卖了。比如2000年1月出的《想飞的翅膀》，这样似是而非的东西比比皆是：

“拒绝领取诺贝尔文学奖的萨特，是一位最会表演的作家。”“他知道，不领奖，比领奖能够给他带来更大的荣誉。”（《旷野的足音》）

“电脑中一篇没有存盘的长篇论文丢失，而大脑中对这篇文章连一句话也记不得了，不亦悲哉！”

“行走在北京的街头，常常遭遇到抓小贩的场面。小贩们夺路而逃，一路狂奔，

真是动如脱兔。而追捕者们也不示弱，奋勇追击，所向披靡。

" 然而，被抓的仅仅是小贩而已。

" 庄子说：‘窃国者侯，窃钩者诛。’

" 从来如此。"（《沉重的闸门》）

这不叫思想。这叫感触，叫想法，叫愤懑。思想应该是建立在理性的判断的基础上的，写作者的文风固然可以各异，但这一点应是起码具备的。可惜，余杰在这方面基本没有。他只是胡乱写出一些东西以图赚钱。然后想当然地去扮他的思想秀。而且他好像越来越把抄书作卡片当成了一种思想的积累。

前段时间，余杰曾就所谓"忏悔"的话题与余秋雨闹得不可开交，接着又扯出有关老余在"文革"中的经历的笔仗。其实"忏悔"这个词的专利权好像不在余杰那儿，倒是另外一匹"黑马"摩罗较早地在文章中使用。摩罗写文章有一套词汇表，较常使用的词有以下几个：忏悔、耻辱、民间、底层、自由、卢梭、鲁迅、黑暗、顾准、良知……以我们看来，摩罗与余杰孔庆东相比，摩罗的文字功底相对要扎实一些，视点也算独到，确有一些篇目属于中规中矩的文学批评。而他的另一部分以所谓"思想"为特点的随笔，则屡屡因为其自身对许多东西的认识存有缺憾、偏颇，他本人又往往偏爱一些带有很强自怜意味的煽情写法，搞得漏洞百出，非驴非马。

就目前大家所能看到的摩罗的作品而言，摩罗显然很适合做一个学者、批评家。但他以"思想"为己任，则显得有点不胜其重负，况且文风也失之随意，率性有余，严谨不足。摩罗有价值的文章多集中在对现当代作家与作品的研究上。如写汪曾祺的《末世的温馨》、写乔典运的《忏悔的另一重意义》、写苏童的《逃遁与陷落》都反映出他的才情和眼光。但可惜的是，摩罗的志向远不在此。他的志向在整个知识界、思想界，他太想成为他多年来崇敬的卢梭、鲁迅那一类给人类或民族指路的思想斗士，可偏偏他的天分、他的知识构成、他的性格缺陷乃至他对我国社会和对人性的洞察力都不足以使他完成这一远大的人生追求。与此同时他大概也忘了，当代的文化界已逐步进入对多元文化的追求时代，以往那种明星式的或民族英雄式的文化人物，今后如无太大意外，将不可能再出现了。所以说"思想家"这个名头对摩罗的文字生涯而言，既不切实际，也不可行。

然而摩罗一味地去追求他的"思想家"角色而导致了一系列令人叹息或发笑的问题。

比如在谈论当代文学为什么迄今没有出现重量级的经典作品这个问题时，摩罗曾写过一篇《耻辱是我们的精神资源》的文章，呼吁作家们要正视生活和历史中的罪恶与不幸，从中发现自己身上的耻辱感，并学习苏俄作家，在写作中走向一种超越和升华。乍看之下，这观点很有建设性，也很真诚。可是，如果我们接下来再往细一深究，问题就出来了：耻辱或耻辱感的发现，对于写作者反省生活、人性乃至自身，固然是一个很重要的角度，但是，它怎么就可以被一代人据以为一种所谓的"精神资源"？我们姑且不论关注了"耻辱"这个话题，我国当代文学能否像摩罗所期望的那样登堂入室，就算能，那么它该不该被我们功利性地视为一种思想或写作的资源？

摩罗的矫情与较劲还体现在他探讨"忏悔"这个话题上。他写过一篇叫《回忆一

下吧，阿拉巴巴》的文章，里面提到过三个在“文革”被杀害的年轻女性——李九莲、钟海源与黎莲。李九莲和黎莲是两个年龄段处在高中毕业前后的少女，两人都对“文革”时我国的现实存有一定的疑问，又不幸都对各自的男友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表述过，结果分别被男友把情况反映了上去，遭致后来的杀身大祸。钟海源则系李九莲的同情者，也是“同案犯”。她与黎莲死时同样悲惨，被司法机关和医务人员联手为某公子、某干部做了惨无人道的活体肾移植，而且没有任何麻醉与缝合。这样的暴行今天谈起来依然令人暴怒和发指。但摩罗谈着谈着就变了味道，他先是由刑场上死难者的血迹而开始谴责“那个年头荡漾在我们脸上的笑容”，忏悔道，“那是无耻而下流的笑容”，继而又指责其中两个女孩的男友“出卖”自己的女友。摩罗在此时犯了余秋雨写《遥远的绝响》的毛病，对历史、对忏悔“言情化”、“滥情化”了。首先我们应认识到，在那个灾难的年代，在那个罪恶的时刻，惟一在死难者的血迹那里变得无耻而下流的，是政治家的笑容，和被他们所纵容的市侩、恶棍们的笑容。此外人等，同属于受害者，谴责他们，是一种丧心病狂泯灭智性的举动。其次，那两个男友的行为在当时是一种“真诚”，一种历代当权者多年来一直想在人民中培植的那种“愚昧的忠贞”，是这种“忠贞”最终导致了他们对爱情的毁灭。在谈论这个话题时，只谴责他们的行为，而不对产生这种行为的根源进行深入剖析。至于他在那篇文章的结尾所写的：“最后，我谨以最虔敬的心灵，为所有受侮辱受伤害的灵魂，为所有在侮辱和伤害中惨遭毁灭的亡灵，向苍天三致祈祷，祝愿他们经过炼狱的磨难，早一天得到最美好的拯救和抚慰。”话这么说，听起来看起来确实漂亮，可总还是有那么一些文不对题，有那么些因了所谓“忏悔”而自以为升华了的沾沾自喜。

不过上面这篇文章在摩罗的文字中毛病还不是最突出的，下面我们再看几个片段，欣赏一下摩罗君的“言情”功夫：

“我在不知不觉中走到了中山纪念堂，偶尔抬起头，突然看见了那个高大的黑色身影，我心头猛的一震，全身立即充血，眼里盈满泪水，我不知道那泪水怎么来得那么快……是的，这就是他，那个用这只手杖摧毁了整个旧时代的人。我似乎感应到了他对我的期待，我的脚渐趋急切，心里默默地一遍又一遍地念叨：中山先生，我来了！当我这样默默念叨时，充盈在眼眶的眼水终于像泉水一样涌了出来。”（《咀嚼耻辱·拜谒中山堂》）

“就在这样的日子里，这样一个阴惨惨的日子里，突然收到小斤的信，她向我宣布她已结婚了……那些天我完全处于一种失魂落魄的状态，我常常在深更半夜从恶梦中醒来，疯子一般地向身旁久久寻找小斤，然后抖动身子又是干位……在一家破烂不堪的旅店里，我向一对男女谈起我与小斤的故事。我忽然说不出话来，立时满脸是泪。我一闭眼，就看见她在地狱里挣扎。尽管她也许活得比我体面，可我总觉得她的生活是那么寒冷，那么黑暗。那蹿动着的死亡的阴影，像一条鞭子每时都在她的头上呼啸，我们曾经共同抗拒这侮辱，可是我终于背叛了她，留下她独自承受这样的折磨……”《咀嚼耻辱·过客之爱》

“有一回我与一个七八岁的小女孩在一起玩，她的聪明和天真烂漫使得我对她十分喜爱。可是当她笑得最高兴最忘情时，我忽然对她流起泪来，因为她实在长得有点

丑。当她长大了，突然发现自己丑陋不堪，那时候，她这天真烂漫的心灵会受到怎样的摧残啊……我怜爱地搂着她，亲在她脸上哭了起来。一边哭，一边想，她真不如这个时候死去。一个女人不能长得漂亮就只能获得生活的一半，一个女人不能长得漂亮真不如早点死去。”《性爱与情爱》

摩罗啊，真是可惜了你的才华。以你这样的夹叙夹抒情笔法，写小说去也行啊，干吗非抱了个“思想者”的招牌呢，真是的。一不留神，还混成了挂羊头卖狗肉。

关于孔庆东的话题我们不想费太多篇幅。此人是众“黑马”中惟一匹与“黑”一点都不沾边儿的。出版商对此人的包装有两条挺绝：一是命名其为“北大醉侠”（好端端一个北大，在比特时代居然冒出一“侠”来，有趣）；二是说他的名字是“继钱钟书以来真正的幽默”。但从孔庆东的作品中一点儿也没看出有关的内容来。我们似乎可从中得出三方面的感受：

第一，孔庆东曾任教北京大学中文系，既为博士，又为副教授。但我们从未见他于学问一途有甚精彩言语，倒是说起有关他深爱的金庸小说，写下一句令人心惊肉跳的话——“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金庸万古流”。一个教“20世纪我国文学”的博士，喜欢畅销书原也是很自然的事情，但把老金抬到这么一个吓人的高度，真让人觉得诧异。接下来不禁庆幸，幸好这路人是在大学里讲整体水准不高的我国当代文学；他要教的是英美文学，还坏事儿了——非得把狄更斯和乔伊斯、福克纳从小说家的王座上赶下来，给你换个阿加莎·克里斯蒂或斯蒂芬·金上去不可，不闹国际民事纠纷才怪呢！

第二，他的文章，怎么幽默了怨我眼拙，没看出来。可怎么他笔下的好些人名都像是从历史书、名家散文和纪实书中抄来的，没有哪怕一点儿新鲜感和活人气儿。不信您瞧：马无水（“文革”坚好像有那么一人叫这个），阿长（鲁迅小说里一女佣），小叶丹（长征时少数民族首领，跟刘自承拜过把子），胡传魁（样板戏《沙家洪》里一胖子），吴用（《水浒》里一老实忠厚的阴谋家）……如果幽默就如此，那真幽默死了。

第三，孔庆东文章之无趣、思想之幼稚，兼以无知者之无畏，比余杰还要过之，如果参我们如是一说，也许许多人会不以为然，甚至会进行反击，但过多的文字会作出充分的证明——

“现在香港的黄飞鸿影片中，黄飞鸿动不动就自称‘广东省十大杰出青年’，这分明是对我们党团系统所评选出的各种‘十大杰出青年’的挖苦讽刺，不知为什么我们的文化宣传主管部门竟然允许这种影片在大陆胡说八道，难道说我们那些正牌的以冯巩为代表的十大杰出青年还不如黄飞鸿那些街头阿飞吗？大概我国已经没有青年了。”（《文化不能沦陷》）

“他们蒙骗小作家，要笑知识分子，愚弄德育教授……实际上，这种心态不过是顽主们自卑心理的顽强补偿而已。”《重读〈顽主〉》

“《天龙八部》的反战和平主题，与世界文学也是呼应的。”《金庸小说的文化品位》

“1998年，流行一首很肉麻的歌，叫《我是女生》。那歌唱的不像是女学生，而像是雏妓。我同龄的那一代女生，虽有愚贤之分，但在人格情操上，真可以做当代女生

中国文化解读

的国母。”（《遥远的高三·八》）

.....

而就是这么一个孔庆东，外加上他的北大同仁余杰等人，近来出书，竟然也模仿“五四”，打出了“新青年”的字号，实在可以被选作时下“学者包装”的巅峰之作了。对此，我们或许会感慨万千，或许也同他们的行径痛不择言。无论如何，总有一结论。

人在世上，有一个最大的罪孽就是生产垃圾。物质的垃圾太我，可以去焚化处理掉，精神垃圾过多，却是以败坏，许多善良人消化好东西的胃口。而更悲哀的莫过于我们许多时候，还把制造垃圾的干劲视为勇气。

第二章 婚姻、爱情"多面玲珑"

现在有许多人婚姻道德沦丧，嫖娼、包"二奶"等，离婚率升高。这严重使得许多妇女儿童受到伤害，这是一个应该引起重视的社会现象。但如何解决这一社会问题，如何分析这一社会问题，并且从各个角度：历史的、文化的、社会的、心理的分析这一问题尤为重要。社会发展中的诸多问题只能在经济的发展中才能得到很好地解决，婚姻家庭，情感问题也一样，必须在人们的思想经过裂变、动荡；最后经过反思、沉淀和稳定之后，才能自行解决，这需要时间，而妇女们自立自强思想的解放与确立也需要时间。

1. 闲语婚外情

现今许多人由于道德沦丧，生活空虚而导致的婚外情，并致使离婚率升高，这一效应产生了许多严重的社会问题，有等于社会各界以有效方法予以解决。而如何行动则显得尤为重要。因为如果从法律的方式上来解决它，那么这部法律不仅要公正、合理、体现公众的要求，满足社会安定的需要，而且要遵循社会发展、进步的原则，即体现社会主义精神、道德的要求，为妇女真正解放，真正地自立做出现在的和未来的保障。

如果仔细观察，你身边频频出现的婚姻危机、离婚、婚外情确实屡见不鲜了。

这些被丈夫背叛，被丈夫抛弃的女人或悲天抹泪，或大打大闹，不打不闹也往往以死相逼，很少见以情动人，以理服人或痛痛快快离婚的。现在，更多的妇女寄希望于新《婚姻法》，想让法律来保障其家庭的完整，感情的完美。这是一种相当愚蠢和不切实际的行为！

首先，在丈夫出现背叛或提出离婚的时候，如果你还爱你的丈夫或对他还有感情，你一定是要争取的。当然你应该对症下药，看哪一点使你的丈夫对你不满了，你们之间还存在什么不和地方。你找对了方法是可以打动他的，必定是自由恋爱的结发夫妻。再者如果你有耐心，你可以给他足够的时间，等待他回头。媒体不乏类似这样的报道，妻子的爱心和耐力终于换回了丈夫的"浪子回头"。这不是任何一个平凡的女性都能做到的。她需要有深厚的爱情、宽广、容人的胸怀和非常人所能想象的坚忍和耐力。同时，你在这种情况下，一定不要再有"这样做，值不值得"的考虑。

如果一个男人富有爱心、同情心、珍视情谊、重视道德，那么他一定会被感动，重新找回自我的。

其次，婚姻的基础是爱情，爱情没了，婚姻也相当于死亡了。一些妇女拼命要得